

# 闽南文化的中原情结与在地特色

林 枫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闽南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并由东南沿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所逐渐造就。闽南文化存在着浓厚的中原情结，也有着鲜明的在地特色。

## 闽南文化的中原情结

闽南文化自认中原渊源深厚，存在着浓厚的“中原情结”，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有明显表现。

### 一、强调自身的中原汉人血统，塑造显赫的家族历史

上古时代的闽南为闽越人居住地。秦汉之后，中原汉人逐渐进入闽南，汉唐五代之后，北方士民举族举乡、更多地移居闽南，与闽越土著交融，成为闽南主体居民，进而切断了越人土著原有文明的发展，而代以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这对此后闽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开发与发展，起了主导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北方汉民迁居闽南，以中原文明的相对先进性，在当地原有闽越土著文明面前，自然表现出自豪感和优越性。尤其是在晋、唐、五代的迁闽高潮中，中原汉民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进入闽中社会的，这就使得入闽的中原世家，一开始就以门第相高，以世阀自豪。而那些贫穷的人迁汉民以及原有的闽越土著为了适应社会生存和谋求发展的需要，也纷纷附祖塑宗，建祠堂，修族谱，崇祭祀，相标榜。

唐初陈政、陈元光入漳，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入泉，是汉民入迁闽南的标志性事件。由此，闽南居民在声明自己是北方汉民后裔之余，往往还将祖先入迁闽南的时间前移至唐宋，祖先始迁地也有不少直接着落河南光州固始。现在居住在泉州、厦门一带的陈姓家族，据称大部分是在唐代前期迁入福建的。漳州沿海一带的所谓“五山李姓”，据称其入闽始祖为唐高宗李渊的第二十一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祥，因受封于闽越一带，遂于武德、贞观年间从陕西迁入闽南。同安大姓郭氏，据称出自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之后。<sup>1</sup>

### 二、强调闽南文风鼎盛，科举昌明，是儒家的重要传承地

闽南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学术事业理所当然地落后于中原地区。这种状况不能不给边陲地带的移民社会带来一定的自卑心理，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

素以中原士族后裔相标榜的福建士民，十分珍惜自己的祖先从中原不断南迁带来的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把接受和推广儒家文化作为建构福建社会的首要任务。加上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致使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经过汉晋、唐代的酝酿初创之后，到了宋代，已经迅速赶上中原的先进地区，这一点从宋明清时期福建中进士人数之多及其在全国进士人数中所占比例之高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尤其是闽南地区，在山多地少的福建堪称农业生产环境优良，与海外的经济文化联系又比较密切，发展文化学术事业的条件比起福建其他区域显得优越，儒家文化的教育和普及更是走在福建的前列。但是，闽南毕竟偏隅于东南海滨，地方文化教育再怎么发展，也较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的主流。

西周末年，王室东迁，文化中心相应由西向东转移，邹鲁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地位凸显。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因系周公封国而得到不少的礼器、文物、典籍，所谓“周礼尽在鲁”。孔子诞于邹，居于鲁，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删诗书，着春秋，创立儒家学说。之后，邹人孟子，继道统，辟杨墨，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复兴儒家。西汉的五经八师，东汉的五经博士，邹鲁代有其人；直至两汉魏晋，经学大儒、思想名家，邹鲁仍不时出。儒家五圣，即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孟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均出自邹鲁。邹鲁之地“俗好儒，备于礼”，成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闽南各地多以“海滨邹鲁”标榜，盛称邹鲁之风在当地的传承与发展，自诩理学名邦。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却在闽南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从闽南地区的朱熹形象也可以看出闽南对理学的极力推崇。在宋代，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本人也屡屡遭到政治迫害，但却在身后备受推崇，被尊奉为“中国理学之集大成者”，被明清统治者奉为理学正宗，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文化与学术地位足以傲视中华。不同地域所想象的朱熹形象大相径庭，在浙东、武夷山、江西铅山、庐山白鹿洞等处，朱熹或是偏执卑劣暴虐的小人，或是与狐仙变成的美女缠绵悱恻的多情书生；唯独在闽南，朱熹的民间形象最严肃、最正统。许多以朱熹为原型的民间文学形象，如《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青蛙带枷锁环翠》《齐齐松》《茅笔镇流》《葬大林谷镇蟹精》，将朱熹想象成大智大圣的神儒形象，一点都不敢亵渎。朱熹在拥有神力之后，不仅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且能更好地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甚至承担起斩妖除魔的重任。<sup>2</sup>

### 三、强调中原古汉语在闽南的留存

北方汉民入迁福建，挟汉族文化之优势，冲刷、消磨福建土著语言，直至在与闽越土著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甚至于相互对抗的过程中，孕育产生独具特色的闽方言。从东晋到唐末，中原汉人持续迁入福建，现在福建境内的主要方言即形成于移民过程中：东晋南朝的移民与闽北方言的形成密切相关，五代闽的割据和闽东方言的成熟紧密相连，初唐的征战、屯垦则直接促成闽南方言的定型。

中原汉语对闽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闽南方言的形成与北方

汉民入迁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伴随，与中原语言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呈现出不同时期汉语的层叠性表征。闽南方言的研究者、使用者，不无自豪地宣称，闽南语中留下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语音、词汇等遗存，而且很多还是独一无二的。诸如称铁锅为鼎，称热水为汤，称口为喙，谓跌倒为跋，称大片平地为坪，称泥土为涂，称足为骹，称糯米为秣；用“沃”表“浇”之意，用“底”表疑问指代词“哪、何”，用“着”表“在”与“应该、需要”。<sup>3</sup>

事实上，闽南方言在一定意义上有着与其他闽方言共同的源头，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隋唐以前的汉语特点，具有语音、词汇方面的共同因素，今天已经大相径庭至于不能通话的闽东闽南方言，仔细辨别，不难发现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共同之处。<sup>4</sup>

#### 四、强调闽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雅化”继承

举凡民风习俗、戏曲音乐、建筑工艺，闽南文化都强调与中原的深厚渊源，强调闽南对中原文化的忠实传承，强调中原文化旧有分子在中原故地的迷失与在闽南的保存，尤其强调其中高雅成分。

例如，梨园戏、南音均以古老、珍奇而著称。梨园戏属于古老的剧种，有着悠久历史而闻名遐迩，被称为戏剧“活化石”，至今仍保存了大量宋元南戏曲目。唐末，随着大批中原人士入闽，盛唐以来流行中原的大曲也被带进福建，五代时期，大曲已经在闽南地区有所传播，后来又进一步吸收了千百年来不同时期不同戏曲的唱腔音调，并与闽南民间音乐相融合，大约在宋代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南音。南音不但保留了唐末五代北方曲乐的曲牌和音韵，而且像弋阳腔、青阳腔、昆腔等目前已很难寻觅的古代曲艺之精华也都能在其中找到。保存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诸多元素，被誉为东方古典艺术的珍品，在世界古典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再如，闽南民居建筑注重靓丽的外观、身份的彰显。“红墙白石双波曲，出砖入石燕尾脊。青瓷彩绘交趾陶，雕梁画栋玉门殿”。这是坊间用来描述传统闽南民居建筑的四句顺口溜，写实生动，特色鲜明。在闽南民居建筑中，广泛使用“烟炙砖”作为外墙建筑材料，色彩艳丽生动；建筑屋顶的正脊采用据说只有举人以上的住宅才可使用的燕尾脊，飞扬纤巧，又拔高了屋主身份；传统闽南民居以泉州最为典型，泉州地区基本民居形式为“官式大厝”（或称“大厝”），有些大厝还被称为“皇宫起”，堂皇典雅、肃穆大方。

#### 闽南文化中中原情结的由来

闽南文化中中原情结的形成，可以从若干方向查找根由：

#### 一、中原人士对南方历史的早期描摹，构成了闽南文化中中原情结的固有基础

从文献中考察福建的早期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客位的观察，是文化优越的中原汉

人对化外之地的远观甚至于想象。随着华夏文明由北而南的扩展，华夏视野也不断向南扩大，中原汉人对南蛮的观察越趋详细，越趋真实。而在这种观察之中，最接近中原、最早与华夏文明接触的区域、民族，无疑会率先出现于汉文典籍之中。洞庭、鄱阳间的“三苗”，江浙一带的吴、越，直至于百越各支系，中国东南土著民族依次出场。汉文典籍的描述，与“南蛮”发展水平的整体滞后以及由北而南递降的格局，以及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完全吻合。一方面，这些珍贵的历史典籍可以反映出福建与华夏文明的接触；另一方面，这些珍贵的历史篇章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再现福建早期历史，建构福建早期历史端赖于更多的考古学发现。

南方早期文明的落后，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南方自身载籍的缺失。梁启超分先秦诸家为南北二派，且云：“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体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于南，亦缘当时载籍所传，北详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残缺散佚而不可观者，尚多多也。”<sup>5</sup>在汉文典籍中，对南方早期历史表现出一种从上对下的非平等观察。“闽”与蛇有关，《说文解字》：“闽，为东南越，蛇种。”中原人认为南方多蛇，故多以蛇（虫）来命名他们所瞧不起的南方人，如闽、蛮、蜃、蜀等，战国时期就连被中原人称为南蛮的楚人也认为比他们更南方的是蛇虺之地。秦汉以前，中原称越族人，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盛行原始巫术。到了汉代，中原人士依然认为闽中及其居民为“方外之地，鬻发纹身之民也。”文献中充斥着对南方荒莽之状的描述：“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入越地，輿轿而踰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sup>6</sup>在一些自然条件稍好的地方，人民利用简单的生产技能，过着自然经济生活，“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眚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sup>7</sup>“粤地……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纡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鏃。”<sup>8</sup>在中原王朝看来，福建仍然属于边缘的未开发的蛮荒地区，需要实行军事管制，因此东汉时，“冶”改为“东侯官”或称省“侯官”，而“侯官”是汉代管辖边境地区的一种军事组织。

北方对南方早期历史“落后”的描述，构成了南方认识自我历史的基础，由此自然产生步中原之后的自卑心理，以及向先进中原学习、靠拢的强烈意愿。

## 二、中原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构成闽南文化中原情结的客观追循

按照媒介文化学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支配性国家可以通过产品、时尚及风格向依附性国家输出，创造出特定的需求和消费形态，进而巩固支配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这一理论关注了跨国或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地

位差异性。正因为不平等，在跨国交流中对输入的文化有所选择、拒斥甚至抵抗亦是常态。

由此而言，对南方地区来说，接受北方中原文化，有一种文化认同与地方本位、文化接受与文化自尊的双重矛盾，在强势文化的传播压力下，相对弱势的文化试图保存差异性；其次，南方地区接受中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人群，是相对的精英人群，他们对中原文化是选择性的接受，选择性地接受他们认为非大众的高雅、上层文化。

从政治、文化格局上看，南方对于北方的劣势地位直至唐宋才有明显的变动。《史记》记载了几次汉廷对闽越国问题的朝廷辩论，那种中央、正统对化外之地的蔑视、不屑跃然纸上。文化中心不论，政治亦复如此，中原人士一直对南方心存不屑，南方人难以进入中枢。东晋之前，执政者多为北方人，南方人常遭排斥。《全晋书》卷54：“吴楚之地，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南史·沈庆之传》云，“武帝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直至北宋初，太祖也表示不用南人为相，甚至将此话刻石于政事堂上。宋代执政大臣也时常排斥南人，据《江邻几杂志》，寇准为相时，南人萧贯为状元，寇准向皇上进言：“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改以北人蔡齐为状元。南渡之后，朝廷用人仍存南北纠葛，甚至于相互攻讦。

中原人士以自己的标准作为南方“落后”的参照系，占据了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把持了话语权。为了向文化中心、政治中心靠拢，较之吴楚更为“南方”的闽南自觉自愿地向中原学习。

### 三、中原汉民入迁，构成了闽南文化中原情结的内在心理

福建的开发历程，是与中原士民入迁过程铰接在一起的。中原汉民源源入迁，八闽之地由荆榛草莽、一派荒凉到东南奥区，“吾闽自汉武以来，声名始达于中州；自欧阳行周而后，文物始见称于闽人。嗣是以降，历宋逮今，风气日开，地灵日辟，人物之伟特，文章之都丽，山川卉木之奇越，禽鱼货贝之珍异，甲于天下，遂称东南一奥区。其人亦多温雅淳厚，敦笃故旧，称风土之美者，亦必以闽为首”。<sup>9</sup>

秦立郡县，建闽中郡，闽中郡包括浙南、闽北、赣东诸地，中心为东瓯（今温州）和东冶（今福州），福建始被纳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中原士民大规模迁移入闽始于西晋，在西晋的永嘉年间、唐初的高宗时期和唐末五代时期形成三个高潮。晋江因为晋人居于江滨而得名，“晋江，在城南里许，盖笋江、浯江、溜江之总名也。以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而县名因之”。<sup>10</sup>除了这三次高潮之外，从东汉至明清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中，北方士民入闽者不断，特别是宋末、元末战乱之时，均有不少北方人迁入福建。其中既有直接来自河南等北方地区的，也有从两湖、江浙、江西等地转徙而来的。从近现代福建的居民结构来看，福建固有的土著居民已经完全被中原移民所融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原各地以及大江南北迁居而来的士民世家。

移民入迁与转化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有着中原士民关万里、长途迁徙的艰难苦楚，也有着土著民族与外来民族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悲欢聚散，在移民、斗争、融合这一复杂过程的长期磨炼中，福建人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比较能够适应陌生恶劣环境、勇于冒险、不断迁徙的移民性格。移民性格与福建家族的多业经营、外植倾向，有着十分密切的相关性，移民性格拓展了福建人民的生存空间。

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闽中由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移民入迁，深深地影响着闽南的人文思想。中原文化随着入迁汉民不断输入，不断冲击、塑造闽南文化，中原文化制度不断浸润闽南，内化为闽南文化的重要成分，自然而不可分割。

## 闽南文化的在地特色

我们曾将闽南文化特征归纳为：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多源复合的人文性格，冒险打拼的进取精神，异军突起的文化学术，历久不息的乡族观念，杂乱无序的民间信仰。<sup>11</sup>而这些特征是在数千年社会文明的开发历程以及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中所逐渐形成的。

### 一、闽南自我发展道路与闽南文化的形成

以北方、中原为中心的考察，遥远边陲的福建、闽南的早期历史必然是一种被动的、不断接受北方影响和传播的历史，福建、闽南都只能是被动接受中原辐射的落后地区。

抛开文字记载，闽南历史实际上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华夏文明孕育早期，闽南虽然不是文明中心区，但也星星点点分布着人类活动的痕迹。旧石器时代，沿海低山丘陵地带是闽南人类的主要活动区域，漳州莲花池山发现了明显不同于北方细石器文化、距今4-8万年的旧石器工具，东山海域、漳州甘棠山等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或稍晚些的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闽南经历了（石尾山）富国墩文化（距今6000-5500年）→（陈桥）腊洲山文化（距今5500-5000年）→（左宜恭山）大帽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诸阶段，在山区华安，岩画广泛分布，石铤、石斧陆续出土，有着新石器中晚期珍贵的文化遗存。大帽山地处海岛，居民基本上以海为生，不从事任何农业活动。大帽山居民的航海术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居民能够经常穿越台湾海峡。<sup>12</sup>

夏商时期，中原进入青铜时代，而闽南土著民族则仍然处于新石器时代，并发展了东南土著印纹陶文化。印纹陶遗存为代表的早期古文化，是东亚大陆新石器、青铜文化总谱系中最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环节。就闽南来说，印纹陶文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夏商时期为相对独立的虎头埔-蚁山类型，西周春秋间为浮滨文化，战国秦汉时代发展为头岭-犁头山类型。

周代，青铜文明的传播已经扩展到福建全境，但在闽南表现出文化内涵的贫乏，青铜文化长期处于不发达阶段。既因为闽南土著文化表现出的顽强继承以及闽南缺少

铜矿的天然因素，也因为中原文化经由吴越式的土墩墓文化因素传入福建的明显轨迹导致的信息失真。

考古学者很早认识到以有段、有肩石器和印纹陶文化为代表的东南土著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特殊性。在东南印纹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先后注意到东南早期古文化因海洋人文特质、海洋联系而区别于中原北方华夏的大陆性文化。林惠祥先生称福建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并开创性地将福建的考古材料放在东南亚和太平洋考古的大背景中去分析，大胆地指出福建的史前史与华夏历史不同。<sup>13</sup>凌纯声先生则通过民族学材料的对比，系统阐述了包括福建在内的沿海地区与太平洋原住民的密切联系，提出了“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的概念，以“珠贝、舟楫、文身”作为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的标志，以区别于“金玉、车马、衣冠”的华夏大陆性文化。<sup>14</sup>苏秉琦先生在1979年提出将我国早期古文化的关系格局划分为“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地区”两大部分，各自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向前发展。1981年，苏先生进一步提出，距今4000~5000年，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进而从全国范围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北方、东方、中原、东南部、西南部、南方等六大区系。<sup>15</sup>

转换学术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南历史发展有着自己内在的不受北方影响的因子，而这恰是闽南文化的底层。

## 二、闽南文化的边陲性与外溢性

闽南文化内涵深刻，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其根本底质则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态；既遵循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做出贡献，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和约束；既有步入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却又在潜移默化之中造就了诸如乡族组织、帮派仁义式的社会结构。这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可以把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人文因素，有机地磨合和交错在一起。也许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闽南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使得闽南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

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大背景来看，闽南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华夏—汉语—中国”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寻找位置的过程。因此，闽南人一方面在政治认同上追求“中原人”的身份，刻意表明自己从中原迁移而来的族群背景，渲染自己的中原血统；另一方面在文化认同上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表述，刻意诉求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性。而这两个追求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悖逆，促使闽南人不得不在此过程中，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不断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策略性的解释，

并进行策略性的文化创造。他们强调中原血脉，用追溯出来的正统性对自身的历史进行重构，希望借此模糊甚至于抹煞边陲性，从而获得分享“中心”权力和资源的资格，而这一切，恰恰从另一个方面真实映照出边陲性的特征。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向东南沿海边陲的发展和延续。因其地处边陲，从而向心性与离心性并存；因其发展和延续，从而更向台湾、东南亚扩张，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旺盛的生命力、张扬的个性，决定了闽南文化的外溢性，而另一方面，外溢性进一步增强了闽南文化的可延续性。

因其外溢性，闽南文化方得以在闽南以外诸多地域生根发芽，长久存在。在东南亚，来自相同地域、说同一种闽南话的往往结合成帮，并且因为操相同方言和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与其他帮群相区别。如在新加坡殖民时代早期，闽粤移民内部存在着五大帮群，讲闽南方言、以来自福建漳泉为主的福建帮，与潮帮、广帮、客帮、海南帮相区别。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加坡形成的诸多移民社群中，有着包括海峡华人（即说着一种夹杂着闽南方言和马来语的Baba Malay的土生华人）、永春、南安、金门、长泰等社群在内的闽帮社群。<sup>16</sup>而中国台湾地区则是闽南文化外溢性最为典型的存在。

闽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与海洋互动的过程。闽南方言、民风习俗、宗族组织、宗教信仰、民间崇拜、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等等，都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们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既有中原遗风，也有海上传来的西风浸润，如闽南的伊斯兰教信仰、摩尼教遗存，佛教中也见有高鼻深目的塑像。闽南人从事海上贸易，闽南人驾着航船移居海外，闽南文化对海外、对台湾地区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台湾多数人讲的是闽南话，拜的是闽南传去的神祇，东南亚华人的生活习俗处处透着闽南风气，而这种辐射也是通过海洋传递的。更重要的是，海洋促进了闽南人文性格特征的塑造。在以海为田的生涯中，闽南人民克服了株守故土的观念，或下海以商，或外出为工，具有了一种义无反顾的流动性格；他们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亦培养了积极的冒险性格；他们在与外界的交往中衍生出开放的性格，但同时也养成了强悍好争、孜孜为利，相互残杀，屡成仇讎。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 注释：

1 其实对祖先的崇高塑造，早已有之，且遍布各个地区，参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第85-86页；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五，《正俗二》，中华书局1959年4月版，第322-323页。

2 戴冠青：《想象的狂欢：作为文化镜像的闽南民间故事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9-42页。

- 3 参见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1-38页。
- 4 许长安、李熙泰编著：《厦门语文》，鹭江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8页。
- 5 《梁启超全集》第三卷，《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574页。
- 6 《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标点本，第2778-2779页。
- 7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标点本，第3270页。
- 8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6月标点本，第1670页。
- 9 周亮工：《闽小纪》，黄虞稷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页。
- 10 道光《晋江县志》卷四，《山川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9页。
- 11 林枫、范正义：《闽南文化述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 12 焦天龙、范雪春：《福建与南岛语族》，中华书局2010年5月版，第92页。
- 13 林惠祥：《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 14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海外杂志》1954年第3期。
- 15 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文物》1978年第3期。
- 16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6-12页。